

微刺激有多“微”：有甜头民资才肯投入

4月初以来,“微刺激”一词不断见诸报端。“微刺激”,到底有多“微”,又该如何“刺激”?这不仅是在决策者面前的课题,也是诸多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微刺激”政策之推出,其着眼点应在于通过释放市场活力,达到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良效,并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等多重目标中寻得平衡。问题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如何界定“微”的边界才能达致以上诸种目标?

5月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微刺激”政策功劳究竟几何?在“三期叠加”的当下,宏观调控方式正在悄然改变,这其中既有机会优势,同时又存风险隐患,如何“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无疑需要官方与民间,合力而为,献计献策。

防范风险不应绑定刺激政策

5月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迎来积极向好势头,而4月初以来的“微刺激”被认为功不可没。宏观经济“微刺激”的力度、货币政策是否放宽等诸多话题已被广泛讨论,决策层将如何掌握这一轮政策托底的火候会成为业界猜测焦点。

与此同时,不少地方政府也借势推出稳增长组合拳。在“三期叠加”的当下,未来数年改革都将是主题,4月以来的“微刺激”政策又引发了业界对于宏观调控方式转变的思考。

近日,带着诸种疑问,记者专访了银河证券董事总经理左小蕾女士。

“微刺激”组合拳非经济回暖主因

记者:5月制造业PMI等数据显示经济出现转暖迹象,这与4月初以来的“微刺激”政策是否有关?

左小蕾:“微刺激”政策究竟哪些已经落实了呢?中西部铁路投资、棚户区改造和80个引入民间资本的项目都需要时间去落地。如果一个月中,确实有落实,那就和“微刺激”有关,但我觉得不太可能,尤其是与投资相关的内容。

经济出现回暖迹象,可能主要还是与季节性因素和经济自然波动有很大关系,中国宏观经济一般都是下半年要好于上半年,当然“微刺激”政策陆续推出会对人们的心里预期产生积极影响。

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当然存在,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中,肯定会有一段时间缺乏经济增长动力,但是我有些不解,为什么目前有些宏观分析者总在唱衰,频繁提到经济会下滑,要崩盘。我们的宏观调控是有指标在的,只要就业没有问题,通胀没有上去,短期政策不宜太急。

记者:您怎么看待目前政策托底的做法呢?

左小蕾:如果是在延续不合理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去刺激经济,一定会适得其反,今年刺激了,那么明年怎么办呢?

中国正面临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机遇期,如果总停留在短见思维上,就可能错过这个时期,2020年我们目标是实现GDP总量翻番,肯定不能依靠刺激去实现,需要释放新的活力,不合理的東西要改掉,否则增长是稳得住今年,稳不住明年,必须要找到长效机制。

我们宏观调控也需要创新,切勿停留在惯性思维中,不能沉不住气,更不能被误导。宏观政策要稳的含义就是抓住战略机遇期调结构,只要没有大规模失业,没有物价飞速上涨,GDP增速究竟是7.3%还是7.5%,其实并没有太大关系,而且今年已经明确提出区间调控概念了,不能为了稳定增长数字去稳增长。

战略机遇期宏观调控思路谋变

记者:宏观调控在战略机遇期需要有怎样的改变?

左小蕾:中国流动性并不紧缺,理财产品高息揽储,人为把利率提高,或者是支持了那些不该支持的行业。目前我们应该让资金更多地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留在金融机构。

要尽快推动利率市场化,让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服务,让资源更好地配置在实体中有成长性的领域。

我们需要长短结合,可持续性地稳增长,既能稳得住今年经济增长,也能保证明年经济可以平稳运行,不能老是那么“几板斧”。投资当然可以而且也是必要,但是要搞清楚投什么,不能盲目投资。如果是想把经济增长稳定在数据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向过剩产能去投资,但这样累积下来的问题肯定会更严重。

经济肯定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呈现上下波动,宏观调控不是去把经济规律调平。在危机时候,变化大起大落,需要调整,要保持稳定,正常情况下的起伏,就没必要去调,怎么能不让经济增长有起伏呢?应该让市场自己去产生内生调节和恢复的能力,政府的作用应该是在市场信号失灵时才去体现,政府提出7.5%的经济增速也是一个预测指标,不能在导向上强调绝对就要完成它。

记者:增长与改革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去平衡?

左小蕾:现在的增长是相对稳定,我们要有自信,对经济要有正确的判断,战略机遇期核心就是需要将经济结构调整到合理水平,使得经济未来会有一个持续发展的可能,这个时期不是让你去追求高增长。

我们还是要沿着既定改革路线去做,不要因为零点几个百分点的涨跌将我们的既定增长方针搁置、延后。

市场机制能够顺应经济周期的变化规律,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是美国经济最强有力的内生修复能力。美国危机修复,重复印证了新产业结构形成与新一轮增长周期同步的周期理论。

要真正走出危机的阴影和影响,不能长时间停留在危机思维之中,依靠应对危机的短期举措,释放已经过剩的产能,“稳定”过去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下的高投入产出比的低效率增长。

我们不主动变革调整,让短期的“增长”为结构调整让步,是违背经济规律的。等发达经济体真的调整到走出危机后,我们在体制上、产业结构上、技术进步上又变成“落后”国家。

防范风险不应绑定刺激政策

记者: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速为7.4%,有观点认为,考虑到防范房地产等潜在风险,

需要政策出手,您怎么看?

左小蕾:现在有一种观点是房地产,或者说房价下跌正成为经济的主要风险。为什么房地产价格不能下跌?谁说房地产价格不能下跌?这来源于什么经济学理论?中国本来房地产市场就存在泡沫,房价收入比已经很不合理,并且投资投机还占很大一部分,这样一个市场凭什么价格不能跌?

任何一个产业,投资和投机都有风险,美国、日本房地产价格都跌,大国小国,穷国富国,房地产价格都有涨有跌。中国房地产下跌应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房地产、地方债和影子银行形成一个风险闭环,存在很大风险。但我们需要做的是打破这个循环,不能再用不合适的办法,去弥补过去的错误。

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累积的风险,地方政府融资本来应该是履行政府职能,提供更多公共服务,结果土地财政推高了房价,把老百姓搞得焦头烂额,这显然不是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做法。

如果为了防范和化解风险,而去用加大投资等办法,我想恐怕不仅化解不了风险,还会加剧它的风险,使它进入更恶性的循环。

记者:就如何化解风险,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左小蕾:总理最近讲我们的改革要有第三方评价,我觉得我们的政策也要有第三方评价,地方政府出台一个政策,需要第三方去评价,看这个政策是否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究竟是不是会带来化解风险的结果,政策制定出发点是否真的是针对化解风险。

关于怎么解决风险,我们都提过解决办法,但是很难施行。地方政府主导的一些投资可能在基础设施领域,回报期很长,债券就存在期限错配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发长债来解决。至于还债资金来源,每年地方政府都有财政转移支付,如果地方政府自身资金不够,就用这部分来还债。

这些方案本身都很好,针对性和实施可能性,但关键问题就是约束了地方政府资金使用,这背后其实就是利益的博弈和改革的困难。

中国经济要按照经济规律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在结构调整上达成共识是第一步。执行力上的阻力,仍然不可忽视。要特别注意防止在执行层面再次让调结构给短期增长让步,甚至为了短期增长的投资增长制造系统性金融风险。

宏观政策要稳的含义就是抓住战略机遇期调结构,只要没有大规模失业,没有物价飞速上涨,GDP增速究竟是7.3%还是7.5%,其实并没有太大关系,不能为了稳定增长数字去稳增长。

市场机制能够顺应经济周期的变化规律,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是美国经济最强有力的内生修复能力。美国危机修复,重复印证了新产业结构形成与新一轮增长周期同步的周期理论。

公共领域有“甜头”民资才肯投入

梳理4月份以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可清楚见到“微刺激”政策加码迹象,且愈发强调有的放矢。

在外需不可控,消费难以短期对经济起到拉动作用的背景下,稳增长的利器仍然在于投资。

房地产投资下滑如何影响经济走向?怎样广开投资财源?带着上述问题,记者专访了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

稳增长 投资仍然是关键

记者:自4月以来的一系列稳增长政策中,投资的位置依然十分关键,您怎么看?

朱海斌:经济回暖与“微刺激”有一定关联,虽然政府没有大规模刺激经济,但是在定向支持方面还是做了一系列动作,这对于拉动内需有一定效果,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外部因素的改变,尤其是美国二季度以来经济重新加速带来的正面影响。

在今天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句话就是投资是今年稳增长的关键,虽然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期,但是投资如果下滑的话,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十分大,一季度经济增速放缓最主要原因也是投资不旺,体现在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下滑很快。

政府这一轮对投资的支持与以往不同之处就在于定向支持,主要领域是棚户区改造、中西部铁路建设以及水利和环保等产业,不是一个全面宽松。

我们现在面临的现状是微观基础有些环节还没有理顺,有些领域还是依赖政府引导、扶持。

从目前来看,这应该也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但从中长期来看,稳投资或者稳增长过程中,政府身影应该逐渐被弱化,微观基础得到改善,这是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方向。

记者:如果前期布置的投资在下半年逐渐落地,会不会又造成重视速度而忽略质量的现象?

朱海斌:按照现在政府定向支持投资的力度,中国还不太可能再次进入重视速度,而忽略了质量的怪圈,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增速一直在下滑,而这两块在整个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会超过60%,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和棚户区投资只能是缓冲投资增速下滑。

防风险 地产投资或降至16%

记者:今年投资增速的一大风险是房地产,您怎么判断?

朱海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看起来已到达拐点。今年前4个月内,住宅销售面积等多项数据均下滑,10大城市住宅库存去化周期已经从今年初的10个月增长至4月份的17.7个月。

同时,房价上涨势头已经降温,房地产市场放缓是一个主要的宏观风险。目前的房地产市场调整与2008年和2012年上半年的调整不同,主要表现在区域差异更大,二、三线城市面临严重的供应过剩压力,而这些城市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占的比重很大。市场调整所持续的时间也很可能会长于过去。

记者:如果落实到经济增速上,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会对今年经济增速造成多大影响?

朱海斌:自1998年启动住房改革以来,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行业。

在基本情景中,我们预计房地产投资的年增长率将从2013年的20%降至2014年的16%,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我们的分析中,房地产投资增长下降5个百分点将会拉低房地产增长2.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反过来将会拖累GDP增速0.3个百分点。

政府已经在促增长措施中强调了保障房的重要性。但是,这些措施不足以抵消商品房投资的颓势。

保障房仅占房地产投资的10%-15%。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保障房的新开工目标已经从2013年的660万套提高到2014年的700万套,但它仍然远远低于2011年1000万套的峰值水平,保障房投资的增长幅度将在未来几年内回落。

还需要注意房地产低迷对投资带来的间接影响,地方财政今年面临很大压力,土地出让金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与去年相比肯定会下降,降幅约在15%-20%,加上地方政府债务作为今年重点风险而被防范。

拓财源 民资须尝投资“甜头”

记者:在地方政府财源吃紧的情况下,资金来源怎样保证?

朱海斌:目前中央政府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强化“非公36条”,鼓励民间投资,财政部也在推广PPP模式,把私人资本引入公共建设领域。

从积极方面看,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可能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如果房地产投资降温,而总信贷政策保持稳定,它将会释放可以投在其他领域的信贷。

这种调整可能会促使政府加快市场化改革,推动稳增长措施加快从需求方向供应方转变。这些变化将有助于中国朝一种更加均衡和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转变。

记者:业界的一个担心是,民间资本是否有意愿进行公共领域投资?

朱海斌:这个问题的确值得讨论,现在PPP模式或其他别的模式也好,说了很多年,但民营资本投资热情始终没有完全迸发出来,这其中可能有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以前政府主导投资时,日子过得很舒服,对民营资本并没有那么大的渴求,现在这个情况可能已经出现了转变,地方政府没有足够资金去做一些投资项目,所以才开放80个项目去鼓励大家投资。

现在的关键就是第二个原因怎么解决,即私人资本肯定是要逐利的,怎么样保证这些行业具备足够吸引力的投资回报。

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在铁路建设领域,私人投资可能会被给予更大的定价权,在运营管理上也获得一些话语权。另外还需要在信贷和税收上有一些补贴政策,这些政府都可以做,80个项目究竟能吸引多大的民间资本进入,取决于改革多大程度上的放开。

政府这一轮对投资的支持与以往不同之处就在于定向支持,主要领域是棚户区改造、中西部铁路建设以及水利和环保等产业,不是一个全面宽松。

从积极方面看,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可能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如果房地产投资降温,而总信贷政策保持稳定,它将会释放可以投在其他领域的信贷。

(新华网)

一家小企业的告白:虽有“微刺激”更想松松绑

北京的土地和西三旗汇聚着上万家软件企业,无数“程序猿”和“攻城狮”们,在一个个的格子间里憧憬和实现着他们的创业梦和中国硅谷梦。

近日,记者造访了一家正在成长的小企业。这家小企业从“微”到“小”,仅两三年时间,从草创时期的三五个人,到目前拥有上百名员工。

他们用创业的经历告诉记者,“税费减免等一系列扶植小微企业的措施很难落地。这些优惠是有‘代价’的。企业不需要优惠政策,只求审批松绑,该市场的部分交给市场。”

扶植小微企业政策难落地

29岁的小梁(化名)黑黑瘦瘦,戴着眼镜,一身运动装,耳朵里塞着耳机。他的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配置得很讲究。这是一般IT男们都有的特征。

“当初选择创业,纯粹就是因为梦想。”小梁说,无数人认为他太疯狂,放弃高薪来屈就每个月2000多元的薪水,在互联网大潮中寻找新机会。

当记者问起他们有没有享受到近两年对小微企业的一系列优惠和扶植政策时,他的创业搭档、同为80后的老张(化名)对记者说:“非常遗憾,我们没有享受到任何针对

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

去年以来,数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都在强调对小微企业扶植的重要性。

“创业第一年,我也曾关注过这些政策。”老张说,“后来发现申请这些政策要办很多证照,耗费时间长。并且这些政策也不是白拿的,需要给政府缴税等的承诺。政策落地比较难,不是那么顺畅。”

公司草创时期的老张他们,无法将精力盯着这些优惠政策。“那会儿我们每时每刻想的都是市场和用户,就这么三个人,哪里能抽出精力来专门跟政府打交道、研究政策呢?”

“我们都在这个圈子(创业公司)里。这圈子不大,面临的问题大致相同。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大家争相去申请优惠政策。”老张说,小微企业需要的是透明而且落地快的“绿色政策通道”。

“如果政策真的特别实用,相信大家对此都会非常敏锐的。如果政策落地要等好几个月以上,那对企业来说就意义不大了,成了鸡肋。”

企业需要的是政策松绑

“现在很多审批在逐渐取消,这是好事。”老张说。

从2013年初,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就把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作为第一件大事。截至2013年11月1日,中央部委已经累计取消或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管理事项。同时,降低了企业登记注册门槛,一系列激发企业活力的改革措施相继出台。

就在三年前,老张去注册公司还得实缴,并且还要验资。他还记得一些不愉快的经历:打电话咨询税务部门找不到人,上门求助还要排队长等候,找到人后几句话被打发、只好往返折腾多次才解决了问题。这耗去了这个创业公司不少宝贵的时间。

“企业的精力应该放在用户和市场身上,不该放在跟政府打交道上。”小梁说,“如果在硅谷,我们只需要在网上填一套表格,一个小时就能完成企业注册了。可是我们创业的时候就不行,可能连一个办公地点都找不到。”

创业时期的这群年轻人,连注册资本都要东拼西凑,自然拿不出更多的钱去租用“合规”的商用楼。许多青年挤挤在租住的民宅里,“曲线”实现自己的梦想。

“政府也做了一些努力,盖了些人才公寓吸引创业就业。”小梁说,但那些空间依然有限,“该进去的依然进不去。那些楼也不一定是企业想要进去的。”

小梁和老赵都认为,科技型创新企业需

要的不是政府给钱、给物,也不是免税收,“我们其实不需要政策刺激。”

“一般的创业公司早期不是处于盈利状态,而是处于快速发展状态,所以企业所得税的减免对公司来说没有太大帮助。”老张说,创业者们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政策刺激”,而是“审批松绑”,“减少对创新型企业的限制和法规上的审批,这对于激发企业的创造力有更好的帮助。”

在融资层面,小梁他们在找金主方面没有太大的困难,因为他们的项目够有创意和增长潜力,吸引了充足的海外风险投资基金。然而,尴尬而普遍的VIE(协议控制)让这些互联网创业公司“有钱难用”。

中国吸引海外资金采用的是VIE方式,包括新浪、阿里巴巴等都是如此。根据相关规定,海外的资金进入国内,需要通过外管局审批。

“我们从成功得到一笔融资到能顺利使用这笔钱,最快也要三四个月。”老张说,“而创业公司每天都在成长。钱至上两个月都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用户、市场和订单都损失了。”

让市场的权利回归市场

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领导小组办